案馆满文工作者还正在编写《满汉辞典》等书。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满文专业人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撰写了探索满文文法规律的论文。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满文工作者就满文诗歌的语言特点和规律作了可喜的研究。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沈阳故宫博物馆的满文工作者对原有的《清语摘抄》作了改造和补充，合编了《新编清语摘抄》，以便利用和查阅。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的穆烨骏先生撰写的《基础满语概论》、《满语文法会要》、《满语地名翻译中的若干问题》等著作，提出了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特别是对东北地方满语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我国在满文方面所取得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近年不少著名的满文学者，如日本的神田信夫、冈田英弘、松村润、细谷良夫，西德的马丁·嵇穆、蒙德，丹麦的麦耶女士，英国的纳尔逊等，先后来我国访问，同我国学者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彼此增进了了解。

总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满文科研队伍，其中一大批中青年同志已成为骨干力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满文文献的发掘和满文的科研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完全相信，经过满文专业人员的不断努力，一定会填补某些空白，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台湾清史研究一瞥（续二）

戎　笙

五、对清史中若干重大问题的观点

台湾实行戒严令已三十余年，一切结社集会的自由，均遭禁止，警察有紧急逮捕权。报刊杂志都要接受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检查，稍不如意，即予查封。在这种戒严体制下，对于清代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其中一些政治敏感性强的问题，始终处在禁锢之中。在史学方法论上，不少学者主张“历史是科学”，有的甚至说“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有的学者还说：“史学所争者为真理，史学家须富有实事求是之科学精神，然后史学之价值始显”。但在那种政治体制下，这些主张是难以实现的。历史学在实际上成为台湾当局的“政战”工具，严格地从属于政治。被奉为正史的《清史》，由研究政略战略的最高机构“国防研究院”主持，就是明证。台湾“国防研究院”主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其昀在《清史》序中说：“深以政治战、文化战之重要，实不下于兵战，得此凭藉，于是筹修清史”。张其昀的话表明，筹修清史的目的，在于适应“政治战”的需要。有人在讨论史学方法论时提出，“我们应该根据三民主义提出我们自己的一套解释才行”。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曲解历史的事例比比皆是。由学术观点而引起诉讼，或导致报刊查禁，或由警备总部出面干预，这样的事也发生不少。如1972年台大历史系教授林瑞翰被控诬蔑岳飞案，1977年由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定谳的郭寿华诽谤韩愈案，以及马沙沟考证孙中山临终时只说过“和平，奋斗，救中国！”没有说过“介石，介石！”而遭致刊物查禁案，是较为著名的案例。在“诬岳案”结案之后，退休的史学教授沈刚伯感慨地说：“古今知识分子都是‘可怜虫’！”“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玉法在《谁应审理林瑞翰被控诬蔑岳飞案》一文中说：“我们一方面希望今后‘政府’尽量减少对教育及学术工作者的干涉，另一方面亦希望教育及学术工作者努力实现研究、教学与发表之自由”。（《新知杂志》第三年第五期）

在这种妨碍学术发展的戒严体制下，许多学者埋头于考证，或潜心于史料编纂。谁要发表什么见解，只能是复述官方观点，或者在官方观点所允许的范围内论述个别问题；少数人不得不发表一些有悖史德的违心之论。台大教授傅乐成在他的《中国通史》自序中说：当今台湾的史学研究，“在方法上虽较清代有长足的进步，但在研究重点上，仍然承袭清代朴学的余风，以考据个别的历史问题为主，对于整个历史的通盘论述，则未曾着力”。著名的法制史专家张伟仁在《中国法制史书目》的序言中感慨地说：“一般做研究工作的人，大多只是随便拣一些资料，草草组合一番，便贸然拿去发表，图一点小名小利。无怪乎目前出版品汗牛充栋，而真有长久学术价值的却少之又少。推究起来，固然因为这些作者不好学问，又不甘寂寞；社会风气只重出版，不问内容”。专攻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杜维运对台湾史学界作了如下评价：“在考据学风下，史学家容易陷在史料与枝节问题里面，而不能高瞻远瞩的看历史的发展，于是贯通性的史学作品，极少出现。毕生研究春秋史，最后写不出一部春秋史来；毕生研究隋唐史，最后写不出一部隋唐史来，史学家耗尽心血研究出来的成果，只是零散的、割裂的，而不能融合在一部体大思精的史书里面，这应当是考据学风所留下的不良影响，也是近二十年来史学的一大缺陷。……真正在原始资料上下工夫的史学家，不肯写贯通性的史学作品，于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史学家，挺身而出，承担了这份史学上的重任，从来没有写过一篇研究性的史学论文，却会出版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甚至于世界通史；有人写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又写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国现代史大纲、中国近代现代史大纲，可以说是到达不可思议的程度！其所以如此，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学术，一般人所读的历史书，大多是这些坏到极点的作品，这是太令人痛心的现象了。”（见《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第53—54页）

当然，这只是台湾史学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台湾有一批真正的学者，热爱祖国历史，讲究史德，尊重史实，努力排除政治干预，勤奋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瑕瑜互见，良莠并存，这是个客观存在。以下就这个客观存在，作一简略介绍。因是管见所及，难免挂一漏万。

甲、关于明清之际

明清交替那段历史，离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了。三百年来，那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有清一代，终民国一朝，一直是政治上的敏感问题。虽然敏感点不同，但敏感性始终是很强的。清政府查禁南明史籍，民国查禁《清史稿》，查禁的对象不同，但共同的原因都是由于作者对那段历史的叙述，不符合官方观点。五十年代末，台湾当局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在《清史稿》的基础上编修《清史》。改写的三大重点是明清之际、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三时期。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总编纂彭国栋起草的《清史》编纂凡例共21条，其中共有5条规定了明清之际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官方观点。这部被宣布为“正史”的《清史》，认为南明政权虽然偏安一隅，仍是中国的合法政权的象征。因此，对《清史稿》中的有关部分作了重大修改，补写了《南明纪》五卷、《明遗臣列传》二卷、《郑成功载记二卷》。对全书中提到南明的地方，都作了相应的修改。福王改称明弘光帝，唐王改称明隆武帝，桂王改称

明永历帝。其所以如此，据彭国栋所拟“叙例”说：“今以‘中华民国’修史。而斥南明为伪僭，殊属失当；今悉改称明某帝，以示明未亡”。南明三王为什么要写成本纪呢？《清史》卷首“叙例”解释说：“夫偏安割据，载记可也。南明诸帝，不宜以载记处之，故别立纪，以尊胜朝，而励兴复”。这样的基调一定，如何看待三百年前的南明史，就不再是学术观点问题，而是一个政治观点问题了。所谓“以示明未亡”，所谓“以尊胜朝，而励兴复”，就是使南明史的研究，从属于台湾当局的“政治战”、“文化战”的需要。台编《清史》中的《郑成功载记》，洋洋四万余言，但是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台湾这样一件作为中华民族首次从欧洲人手中收回殖民地的伟大事业，却只用了大约三千字的篇幅，而且是作为“恢复事业的另一面”来写的，着眼点仍在强调“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康熙统一台湾，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对郑成功的总的评价是“郑氏以一旅存故国衣冠于海岛，称其正朔”，“延明历二十余年”。对李定国也是类似的评价，称他“赤心报国，为明代忠臣之殿也”。这一切都是服从“政治战”的需要，根据政治需要解释历史，“以示明未亡”，“以励兴复”。

《清史》尽管被奉为“正史”，但它的观点并没有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台湾学者并不都是这样看待南明历史的。就连列名清史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萧一山，在《清史》出版后的第二年，修改出版了自己的巨著《清代通史》。他把明朝的覆亡，系于1644年，把南明诸王作为偏安一隅的政权处理，这就使“明未亡”的协奏曲中，出现了大杂音。萧一山还把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都纳入一统时期的政略来写，这就不只是杂音，而且还是反调了。

乙、对清代历史的总的看法

清史是什么？萧一山有两句名言：“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一部清史，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这两句名言，概括地反映了萧一山终身坚持的两个基本观点。这两个观点，对清史学界影响深远。他在阐明自己的民族革命史观时，一方面指出清朝的“仁政惠绩”比明朝多，“苛政暴敛”比明朝少；另一方面却又把所谓的“民族革命”的起因，归结为异族的统治。他说：“我们综论关内十帝，性格和成就都不相同，但是和明朝的君主比较，尚觉高明倍蓰：明朝除开国之君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权臣宦官胡闹；清朝只咸丰帝沉溺酒色，同治帝好作微行，可是也没有像明武宗那样荒淫！慈禧、隆裕宠用李莲英小德张，招权纳贿，也没有像明朝的‘客魏之祸’。明君贤相，仁政惠绩，都比明朝来得多；权奸巨憝，苛政暴敛，也比明朝来得少。为什么我们的先民，还时时刻刻要打倒它呢？这显然是由于种族的关系”。

台湾有不少学者在民族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对清代的历史以及元代的历史，都看成是异族的统治，是中国的不幸。他们称元为“胡元”，称清为“满清”，从称呼上显示出“非我族类”。台湾许多学者，还有国外一些学者，习惯于称清为“满清”。“满清”一词，盛行于清末，民国以后，相沿未改。这是一个带有民族偏见的词语，它的含义是不科学的。“满”是民族，“清”是朝代，两者不能混合。隋、唐、宋、明，没有人称之为“汉隋”、“汉唐”、“汉宋”、“汉明”，为什么要把清朝称之为“满清”呢？历史学家评论晚清政治腐败，丧权辱国，这是指的清朝统治者，既有满族贵族，也有汉族权要，不是哪一个民族的责任。如果合称“满清”，是非就混淆不清了。

台湾有些学者把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领袖所建立的政权，都看成是异族的统治，是侵略

者、征服者，尤其是对元、清两朝。因此把元、清两朝所发生的一切反抗，都说成是民族革命。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民族革命起源于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民族革命思想的种子，则是朱元璋播下的。

1952年萧一山完成了《清史》的缩写工作，这是他的巨著《清代通史》的简编本，十余万字，由华冈出版社出版。在这部普及性的读物中，萧一山告诉读者：一部清史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他说："二百几十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完全为'蛮夷猾夏'的意识所驱使，何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留下许多血痕呢？所以一部清史，实在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形成，无非是异民族统治压迫造其因，吾民族之革命抵抗结其果，因果叠乘，而变生焉"。甚至在《清代通史》导言中，竟把帝国主义分为"满清帝国主义"和"列强帝国主义"。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后，"民族革命之对象，已非满清之帝国主义，而为列强之帝国主义"。这种观点，台湾大多数学者都不赞成。

但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是有影响的。从中学历史教科书到奉为正史的《清史》，除个别学者外，几乎是一致地认为清史是异族入主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反抗异族侵略的历史，因此对清朝的历史，看成是暴虐的愚昧的统治，延误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

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台湾《大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化之延误》的文章，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清朝的统治。作者说："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实用科学，包括天文、历法、算学、物理、舆地、美术以及火器制造等只为极少数人所接受。中国一部分士子学人自视颇高，华夷之见既深，名教观念犹浓，也不易接受新思想。最大的阻力与不幸，则为雍正皇帝的禁教令。乾隆时代，取缔尤严，一再查禁。""这真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到此后中国二百余年的命运。""十八世纪、再加上十九世纪前期，也就是雍乾嘉道时期，是欧洲历史进步最速、变化最大时期，同一时期的中国，统治权操于少数部族手中，用尽方法来巩固他们的地位，消磨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知识的高低判定民族的命运，特别是科学知识。中国的科学知识原本贫乏，明清之际的研究生机，几被雍正乾隆父子所根绝。禁教令虽然为对天主教而发，实际上等于对西方文化绝交"。1979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图说》清代之部的编纂者刘家驹也持这类观点，其中说：雍正下令"禁止老百姓信奉天主教，并将大批传教士驱逐出境，影响中国与西欧文化之接触，延误中国近代化之历程！"

1982年6月出版的庄吉发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对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作了公正的评价。庄先生是利用档案研究清史的很有成就的学者，著述甚多。他在新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说："满洲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袭传统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积极整理边疆，增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关系，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备近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领土主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经过清代长期的统治，满汉畛域，逐渐消弭，各部族之间，日益融和，满汉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终于奠定版图辽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及先民的贡献，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锡伯族学者广禄抱怨某些学者怀着民族偏见研究清史，他说："勿以种族之不同而生仇恨他族之想，勿以语言文字之不同而歧视其他民族文化之低落"。语虽不详，但入木三分。

丙、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

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在台湾并无定论。有人认为明末清初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有人则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然而一般言之，梁启超所主张的道咸以后（即鸦片战争以后）为较多接受的一种”。

萧一山早年就主张从明清之际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在1945年2月出版的《清代史》（原名《清史大纲》）《引论》中说：“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六十年代初修订出版的大部头专著《清代通史》导言中，又重复了他的观点。他说：“清史既属于近世，亦可称为中国近代史。今人常有以近百年史名近代史者，意谓吾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始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自强维新革命诸运动，不过欲救亡图存，建设一近代国家，正如李鸿章所云：‘二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故应划为一时代也。殊不知就世界大势与中国历史观之，三百年以前，方为此‘大变局’之开端。姑无论西洋之近代文明，乃始于十六、七世纪，即就欧亚通航，与西力东渐而言，岂非由于明清之际乎？丰臣秀吉之遣将西侵，哥萨克骑兵之东下远征，与夫葡萄牙人之租占澳门，已为后来日俄及西洋诸国之侵略，启其序幕”。

1964年萧一山为台湾大专学校写了一部教材——《中国近代史概要》。这书就是早年出版的《清代史》。书名改了，内容完全相同。在萧一山看来，清代史就等于中国近代史。与萧一山持相同观点的有影响的人物如黄大受，他所写的180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三大册，以及供高等院校作教科书用的《中国近代现代史》、《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国近代史要略》，都是主张中国近代史起于明清之际的。此外如以编纂史料著称的沈云龙，在他主编的大部头近代中国史料正续编中，也包括了大量明末清初史料。萧一山是台湾史学界主张中国近代史起于明清之际的代表人物。他的这一观点，在台湾史学界以至在国外都有一定影响，赞成者颇不乏人，但持相反意见者也是强有力的。

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郭廷以是持相反意见的权威学者。《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是郭廷以的代表作，是近代中国史的综合纪录。此书所指的近代，“开始于鸦片战争，而于战前的中西关系，仍择要编年，以明其由来”。

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王聿均，在介绍该所的工作重点及珍藏时说：“我们成立的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的划分时间是从鸦片战争前开始，换句话说，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初期中国传统的文化、政治、经济情况、社会组织受西方文明冲击之后，各方面有所转变开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重点及珍藏资料》）

属于另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他在理论上强烈地反对中国近代史开始于鸦片战争，但在科研实践上依然把鸦片战争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由他担任主编，他在前言中说：“甚至直至今日，我们在史学研究上，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仍不分明，继续助长对于世界了解之错误。一个重要的例子便是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这原本是苏俄和中共的分期，他们所谓‘近代’原有一定意义，即指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为封建社会，以后因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来到成为半殖民地社会，如此分期，乃为他们‘反帝反封建’纲领作根据。近年来西洋人亦如此分期，则代表他们的优越感，以为他们的炮舰来到之前，中国还在中古时代！或者传统的东方社会！他们的船炮才使中国近代化！但试问明朝正德年间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明末到中国的利玛窦，与郑成功在台湾作战的揆一，派教士来到康熙宫廷的路易十四，见乾隆的

英使马戛尔尼等，是不是'近代人'？如果是的，何以王阳明、徐光启、郑成功、康熙、乾隆就不算近代人呢？必须外国人将中国人打败以后才算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吗？这不是一个'面子'问题。以中国近代史起于鸦片战争毫无学理根据；而这样也就无法充分说明鸦片战争的原因。不能了解鸦片战争的一切原因，则以后中国的变化，亦不能了解。而也就不能了解中国问题之所在，确立正当的应付之道。因此也就不能判断过去中国文化之性质，以后对外应付之得失，寻求今后正当的道路。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近代史之一特殊时期"。胡秋原虽然在《前言》中发表了如此激愤的言论，大讲"面子"问题，"学理根据"问题，可是在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里，中国近代却是从道光年间开始的，并没有收入他在《前言》中提到的如徐光启、郑成功、康熙、乾隆等对西方及列强的认识资料。

还有一些著作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发表明确的意见。如台湾许多大学历史系作为教材使用的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以及依照"教育部"公布的"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编辑的标准中学教科书，都不提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既不说始于明清之际，也不说始于鸦片战争

上述两派观点，虽然在何时开始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上有分歧，但在如何划分中国近代的标准上，两派又是一致的。双方都认为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从而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

本刊扩大篇幅　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本刊编辑部

为了推动全国清史研究，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经上级批准，本刊自今年起充实内容，增加一倍篇幅，向内外公开发行。

扩充篇幅、改变发行方式之后，《清史研究通讯》将继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努力把它办成一个交流国内外清史研究新成果和学术信息的园地。它主要刊载清史理论、清代政治、军事、法律、阶级斗争、经济、民族关系、文艺、教育、学术、科技、社会风俗、秘密结社与宗教、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华侨、人物等方面的学术研究短文、读史札记、专题研究述评，以及文献与调查、史籍考订等，选载《清代人物传稿》中的人物传记，大力报导国内（包括台湾、港澳）外重要的清史学术活动和研究方面的最新信息。

本刊自1982年创刊以来，广大读者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关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在编辑和校对中发生了一些失误，加之印刷条件所限，致使香港学者何冠彪先生大作《戴名世〈四书朱子大全〉书后》等文出现了刊误，在此，谨表歉意。今后，我们将努力提高编辑校对业务水平，改善印刷条件，力求避免或减少错误。

为了加强领导和工作责任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84)社科研字第22号文件，本刊正式成立由王戎笙、罗明、赫治清、李鸿彬等同志组成的编委会。正副主编和编辑部正副主任名单如下：

主编　王戎笙　**副主编**　罗明　**编辑部主任**　赫治清　**编辑部副主任**　李鸿彬